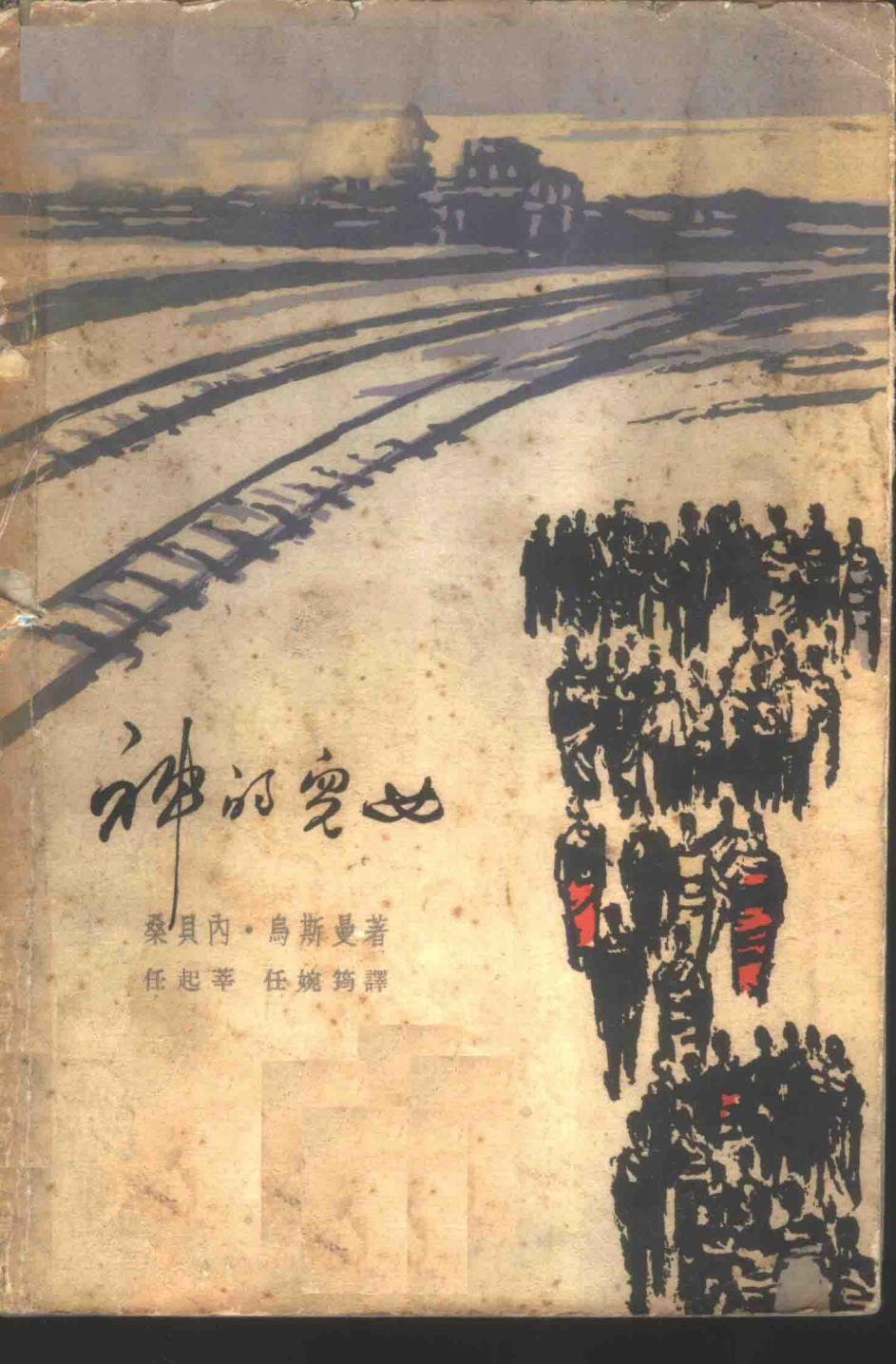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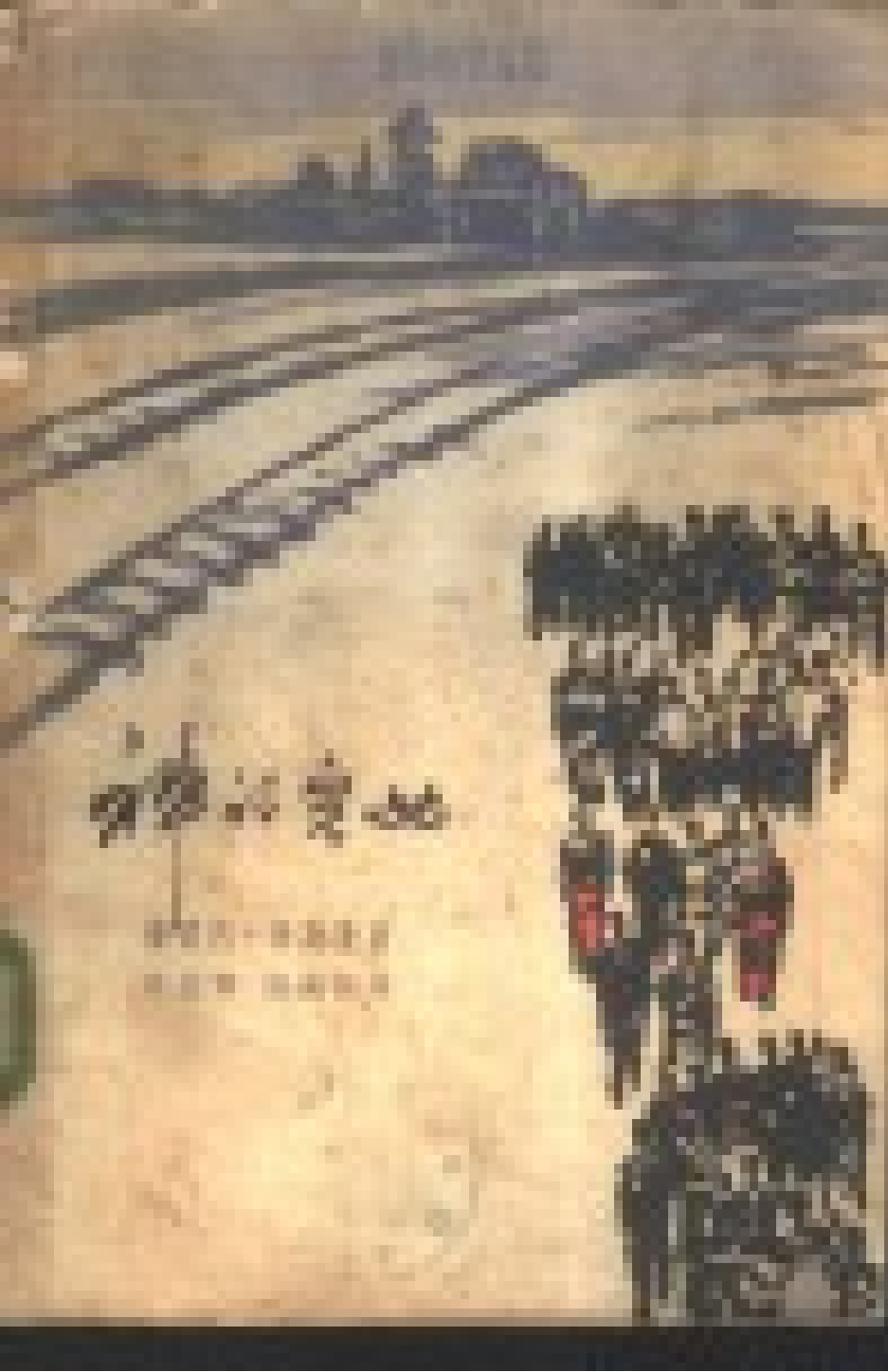




神的寬心

桑貝內·烏斯曼著
任起莘 任婉筠譯



THE GREAT WALL

THE GREAT WALL

THE GREAT WALL

神的兒女

〔塞內加爾〕桑貝內·烏斯曼著

任起莘 任婉筠譯

神 的 兒 女

书号 1798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字数 233,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3\frac{3}{8}$ 插页 2

196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64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3) 1.05 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前 言

塞内加尔作家桑貝內·烏斯曼的《神的儿女》，是一本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年代中，非洲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和非洲工人阶级的觉悟成长过程的优秀小说。

非洲，这丰饶而美丽的世界第二大洲，它曾经是人类古代文明的摇篮；勤劳智慧的非洲人民，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对人类文化有过辉煌的贡献。但是，自从十五世纪西方殖民主义侵入非洲以来，灿烂的非洲文化像遭到暴风雨蹂躏的花朵一般雕零枯萎了，无比野蛮的奴隶贩卖夺去了非洲一亿左右的优秀儿女。非洲遭到了惨无人道的洗劫，变成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压迫下的“人间地狱”。

非洲人民是热爱自由不畏强暴的人民。五百年来，从北非的尼罗河到南非的好望角，从西非的尼日尔河到东非的乞力马扎罗山，英勇的非洲儿女前仆后继，反抗西方殖民主义的斗争彼伏此起，殖民主义者妄想在欧洲建

立絕對統治的迷夢，從來沒有能夠實現。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非洲人民的反殖民主義鬥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經過五十年代轰轰烈烈的民族獨立運動，今天，在非洲大陸上五十九個國家和地區中已經有三十五個國家取得了獨立和自由。還處在殖民壓迫和分割下的各國人民，也正在為爭取獨立和自由而進行着英勇的鬥爭。帝國主義橫行霸道任意欺凌非洲人民的日子已經過去，一個覺醒的、先進的非洲已經出現在地平綫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非洲人民的反殖民主義鬥爭中，非洲的工人階級開始起着重要的作用。非洲工人階級是年輕的。這是因為，在相當長的時期中，殖民主義各國對非洲的剝削主要採取了掠奪農產品和工業原料的方式，因此非洲工人階級的人數不多，流動性很大，主要是采礦工人和鐵路運輸工人。非洲工人曾經舉行過多次罷工，但是由於殖民當局竭力在白種工人中煽起種族歧視情緒，又對非洲工人嚴格限制，不允許他們與世界各國的工人取得聯繫，因此非洲工人長期被剝奪了組織工會的权利，他們的罷工活動往往遭到血腥的鎮壓。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忙於戰爭，無力兼顧，非洲的民族經濟得到了微弱的发展，工人階級人數有了增加，組織性也有所加強。同時，許多被征召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工人和知識分子，在戰爭中

受到了反法西斯斗争的感召，他们回到非洲，在人民中广泛传播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主权利的思想。这些因素，使得非洲工人运动面目一新，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一九四六年八月，南非威斯华特斯兰德十万名金矿工人，不顾警察极端野蛮的恐怖镇压，进行了为时一星期的罢工，要求把工资提高到每天十先令。一九四五年尼日利亚工人举行了长达四十四天的总罢工，一九四七年阿尔及利亚十万工人举行大罢工，同年加纳金矿工人举行了为期五星期的罢工。这些罢工的主要目标虽然是争取提高工资和维护工会自由，但工人阶级在这些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在政治上已经日益成熟。

烏斯曼在这本小说中所描写的达喀尔—尼日尔铁路大罢工事件，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罢工运动之一。这次罢工从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开始，到一九四八年三月十日胜利结束，在西非洲工人运动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桑貝內·烏斯曼，这位有才华的塞内加尔作家，中国读者是十分熟悉的。他在一九五八年参加了第一届亚非作家会议以后，曾经到我国来进行友好访问。他的著名小说《祖国，我可爱的人民》也早已有了两种中译本，受到读者的重视。

他在亚非作家会议上的发言中，曾经豪迈地宣告：“继帝国主义的时代之后，将是人民大众的时代”，而这新

时代的文学，應該是“积极的、大众的、有用的”，是“为活人和劳动者服务的”。他还說：“文学是人民大众的，一切都从人民群众中来，再回到人民群众中去。”他自己的文学創作事业，就遵循着这个原則。

烏斯曼是一个出身于劳动人民的作家。他于一九二三年生于塞內加尔济甘肖尔的一个漁民家中，自幼随着父亲在卡札曼斯河上打魚。他只在小学讀过三年书，以后就离开家乡到塞內加尔的首府达喀尔去謀生，先后做过泥水匠和机車司机的助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被法国殖民者征召入伍，在意大利和德国境内打了四年仗。战争结束后，他到馬賽港口当了碼頭工人。

烏斯曼的文学創作是与他自己的生活经历紧密联系着的，既反映了他亲身經受的殖民主义压迫，也表露了他对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他在一九五六年发表的第一部作品《黑人碼頭工》，就是以他自己在馬賽港口的经历写成的。一九五七年发表的第二部小說《祖国，我可爱的人民》的主人公烏瑪尔·法伊，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非洲青年知識分子。烏瑪尔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到非洲以后，他为了使同胞們不再受殖民者開設的土产收购公司的剝削，計劃建立一个合作农場，由农民們自己銷售农产品。他的这个計劃自然是殖民者所决不能容忍的。烏瑪尔最后被殖民者阴谋杀害了。作者通过烏瑪尔这个人物歌颂了非洲新一代知識分子献身于人民事业

的崇高精神，同时也告訴讀者，走个人反抗的道路，采取不彻底的改良办法，而不从根本上去推翻殖民制度，是不可能真正取得非洲人民的解放的。

烏斯曼在一九五九年写完他的第三部小說《神的儿女》后，又回到了祖国塞內加尔。目前他住在达喀尔。他虽然已經是个知名的作家，但仍旧和他的叔叔、一个老工人一同住在工人区里。他相信，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与劳动人民的联系，才能写出他自己所希望写作的“为活人和劳动者服务的”文学。

無論在作品的結構規模、主題的积极意义上，还是在思想内容的深刻、艺术描写的生动上，《神的儿女》都可以說是烏斯曼已发表的三部小說中的代表作。在这部以达喀尔—尼日尔铁路工人爭取改善待遇的罢工运动为素材的小說中，作者不仅如实地紀录了罢工从开始酝酿直到胜利結束的全部过程，詳細地描繪了非洲工人和殖民統治者的斗争，而且細致地刻划了这次罢工在人們的生活上、思想上所引起的种种变化，塑造了众多的属于不同阶层的人物形象。作者仿佛在我們面前展开了一幅宏伟的画卷，揭示了法属西非洲在殖民主义統治下的悲惨图景，同时，也显示了已經开始觉醒的非洲人民的英勇气概。

这里，需要简单地介紹一下小說所描写的地区的历

史背景。

故事发生在达喀尔—尼日尔铁路沿綫的三个城市，巴馬科、提耶斯和达喀尔。这三个城市，現在分别属于馬里共和国和塞內加尔共和国。这个地区，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古老文明发展最早的地区。从公元三世紀起，直到十六世紀，这里曾相继建立了有高度文化的加納王国、馬里王国和桑海王国。加納王国的都城庫姆比·沙勒，就在現今巴馬科以北三百公里。馬里王国的都城尼阿涅有着建筑精美的宮殿，另一个大城廷巴克图的散科尔清真寺里，設有专门研究法律、文学、历史、地理、数学、天文的学科，是中世紀馳名阿拉伯世界的最高学府。一六三七年，法国殖民者首先侵入了塞內加尔，在大西洋沿岸的达喀尔、圣路易等地建立了最早的殖民据点，在随后的两个世紀中，进行了野蛮的奴隶販卖。十九世紀中叶，法国殖民者开始沿塞內加尔河向內地侵略，曾經先后遭到这个地区的富塔国的統治者阿尔·哈吉·奧馬尔和他的儿子阿赫馬杜以及几內亚著名的民族英雄薩摩利·杜尔的猛烈的抵抗。法国殖民者利用这个地区諸王国之間的不和，施展了“以非洲人打非洲人”的阴谋，各个击破，終于把这个地区置于它的殖民統治之下。

由于土壤与气候条件适宜，法国殖民者把塞內加尔变成了单一的花生种植区，全部耕地中有百分之四十被用来种植花生，年产量达到六十万吨，在世界上占第四位。

为了掠夺这大宗的花生，殖民者在一八八五年修通了从达喀尔到圣路易的第一条铁路。一九二三年，全长一千五百公里的达喀尔—巴馬科—庫利科罗铁路全綫通車。这条被称为法属西非洲的大动脉的铁路，从此年复一年地吮吸着非洲人民的血汗，去喂飽欧洲資本家的錢袋。

铁路是非洲人流血流汗修起来的，铁路工人也大部是非洲人，他們干的活远比白种工人繁重劳累，得到的工資却只有白种工人的几分之一，連家属都难以养活；白种工人生病有医药津貼，退休有养老金，非洲工人年輕力壮时为殖民者卖命，等到年老力衰，就被丢在一边；非洲人要用的日用品，須到与殖民者有关的店鋪去购买，不但要受殘酷的中間剝削，而且殖民者一声令下，就可以封鎖一切生活必需品，連每天必不可少的水也断絕供应，使非洲人的生活瀕于絕境。一代又一代的工人就这样在铁路局的敲骨吸髓的压榨之下过着非人的生活。

小說是这样描写非洲工人的生活的：在铁路局所在地的提耶斯，工人住的是“破破烂烂的小屋，东倒西歪的小木板房”，“房盖上鋪着一张瀝青油布，油布上的窟窿用些烂布、紙板、木片子、破铁罐子胡乱塞着”；而工人的孩子們“全都赤身露体，沒有一天吃过飽飯，瘦得肩胛骨都凸了出来，肚皮脹得挺大”。

但是，就在咫尺之間，在同一个城市里，一小撮殖民者的住宅区“梵蒂岡”中，却是“一幢幢白色的洋房”，“庭

院里葱綠的草皮剪修得整整齐齐，平坦的小道曲曲折折……游廊披檐的柱子上爬着葡萄蔓和长春藤……花园里有着繁茂的紫茉莉花、紅玫瑰、雛菊和龙头花……成群的孩子在嬉戏追逐，有玩着小汽車的，也有玩着那澆花的橡皮管子的。”

这是多么鮮明的对比，殖民統治者的悠閑舒适，正是这样建立在殖民地人民的貧困和死亡之上的。作者所描繪的这种景象自然不仅是西非洲一地的情况，而是許多非洲殖民地的活生生的现实，同时，它难道不也是世界上一切被压迫者与压迫者之間的关系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嗎？

讀到小說中这些关于非洲人民生活的极端貧穷、悲惨的描述，我們不禁心痛欲裂。殖民者依靠被奴役的人民的血汗过着脑滿腸肥、荒淫无耻的生活，真正創造財富的劳动者却忍饥挨餓，衣不蔽体，甚至不能維持最低要求的人的生活。非洲人民是不会长期忍受这种压榨的，憤怒的火山終要爆发，达喀尔—尼日尔铁路工人的罢工，就是觉醒了非洲工人最初采取的一次大規模的斗争行动。

这次罢工斗争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展开的，

一方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經結束，旧日的殖民者重又回到非洲，企图再度加强他們对殖民地的控制，繼續剝削殖民地人民。另一方面，他們所面对的非洲人民，已

經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非洲人民，而是經歷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考驗，受到世界各地民主运动的鼓舞，已經开始觉醒的非洲人民。

因此我們看到，殖民統治者使用了軟硬兼施的手段来鎮压、破坏这次罢工。战前，在一九三八年，铁路工人就曾举行过一次罢工，因遭到殖民者的血腥鎮压而失败了。現在，当年曾亲自命令軍警开枪屠杀工人的铁路管理局局长德让，还想用同样的手法来把这次罢工压下去。他下令封鎖一切日用必需品，派軍警开枪驅散包围铁路工厂的工人群众。他根本不准备考虑工人提出的复工条件，頑固地拒絕会见工人代表；当最后被迫与工人談判时，又恼羞成怒，暴露出流氓本性，使談判无法进行。另一位“老資格”的殖民官員伊斯那，似乎比德让“聪明”些，認識到已經“不能再像一九三八年那样看問題”，主张設法收买罢工負責人，或者另外搞出几个人来成立一个对立的工会。殖民者沒有能收买到罢工的負責人，于是又和御用的总工会狼狽为奸，企图通过总工会来束縛住新成立的铁路工会的手脚，說什么铁路工会是“分裂主义者”，进行的是“政治性罢工”，因此禁止其他工会給铁路工会以支持，阴谋用这种手段来扼杀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我們还看到，殖民者除了亲自出馬外，还利用他們所豢养的走卒来欺騙籠絡人民，让在法国国民議會中“代表”非洲人民的所謂“議員”来劝告工人复工，把一切問

題交給他帶到巴黎的議會里去解決。伊斯蘭教教長也出來向人們宣稱什麼“真主讓我們和法國人生活在一起，我們不該抗拒真主的旨意”。但不管是赤裸裸的暴力鎮壓，還是明目張膽的收買，或是花言巧語的欺騙，都動搖不了工人們“不獲勝利，決不復工”的決心。工人們在談判桌上和殖民者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在群眾大會上揭穿了殖民者的一切陰謀詭計，終於贏得了各行各業工人們的支持，發動了總罷工，逼使殖民者接受工人的條件，取得了全面的勝利。作為復工的條件之一，德讓和伊斯那被趕出了他們橫行多年的殖民地；他們兩人的可耻下場，仿佛一個象征，說明殖民主義在非洲的統治已經開始全綫崩潰了。

對於工人和他們的家屬，這次罷工也是一場嚴峻的考驗。當罷工刚开始時，某些曾經在一九三八年第一次罷工時有過慘痛經驗的老工人，對再次發動罷工表現得顧慮重重，沒有信心。譬如倉庫看守森加萊，一輩子受盡了殖民統治者的剝削，但他看不見工人自己的力量，不敢對殖民者表示絲毫反抗，始終置身於罷工鬥爭之外，最後孤零零地死在倉庫里。森加萊至死是一個沒有覺醒的老工人。另外一個老工人，鐵軌鋪設工長法·凱塔，最初對罷工是否能取得勝利，也抱着懷疑態度。他雖然沒有公開反對罷工，但他却口口聲聲強調“必須周密考慮，再作決定”，直到被警察抓進拘留營里，受盡折磨，才逐漸覺悟

过来。和上面两个老工人作为对照的，是从一开始就积极参加罢工的老锅炉工巴加利。他最初拥护罢工，固然只是由于罢工委员会提出的要求中有一项是为老工人争取养老金，因而也包括了他个人的利益，但在罢工过程中，他每次会议都参加，天天到罢工委员会的办公室去，终于逐步成为一个能自觉地与殖民统治者进行斗争的工人。作者通过这三个不同的人物形象，概括了老一代的工人。

作者用很多笔墨描绘了为数众多的工人家属。非洲妇女，也像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劳动妇女一样，受着比男子更为深重的压迫。由于社会上还保持着某些封建时代的落后习俗，非洲妇女的处境尤其悲惨。但是她们从罢工一开始，就挑起了安排全家生活的重担，而且勇敢地反抗军警的镇压。她们积极地坚决地支持罢工，使得男工人不得不改变过去对它们的看法，最后她们更徒步从提耶斯走到达喀尔，参加了群众大会，对于罢工能够取得胜利贡献了不少的力量。

领导这次罢工的工会工作者，也是通过这次斗争，学会了对付敌人的策略，受到锻炼，而逐步成长起来的。罢工开始时，工会刚刚成立，干部们缺乏经验，像一部刚安装好的机器，还没有开始运转。比如对于公司方面派来的“调停人”，最初他们就没有识破这是殖民者的花招，而准备接受他的“调停”。对于个别不能坚持而偷偷去上工

的工人，究竟应当如何处理，干部們也是經過仔細考虑才想出了“公审”这个办法，既惩罚了去上工的人，又教育了更多的工人。有的干部，还曾經为怎样才能“跟敌人斗争而又不不要怀有仇恨心理”的問題所苦恼。巴格尤戈、拉比貝、杜都、底耶莫柯、哥納德、桑巴·納都魯古这些人就都是在斗争中学习，經受鍛炼，而最后成长为比較成熟的工人領袖的。其中尤其是巴格尤戈，更是作者所着力描写的人物。他是整个罢工运动的“灵魂”。沒有出場之前，作者就通过許多人的轉述，渲染了他的善于领导，敢于斗争。以后，又通过与铁路管理局当局在談判桌上的說理斗争，和群众大会上的讲演，成功地塑造了这个非洲的有觉悟的工会工作者的形象。

除此而外，作者还描繪了一些被卷到罢工运动中来的属于其他社会阶层的人物。罢工对于他們，也是一个严重的考驗，甚至使他們从此改变了今后生活的道路。例如殖民主义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知識分子杜阿达和南德叶·都娣。外号“漂亮小伙子”的杜阿达，因为受过“一点起碼的教育”，和工人接触便总觉得格格不入。虽然被推举参加了罢工委员会，却对罢工的前途毫无信心，最后终于投入殖民者的怀抱，作了叛徒。另一个知識分子，师范女学生南德叶·都娣就不一样。虽然她一向羡慕白人的生活，瞧不起自己的同胞，开始时根本“不懂得罢工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在罢工过程中，她和工人家属

在一起，終于逐漸認識到她自己的命运只能和工人們联系在一起。杜阿达和南德叶·都梯走的是两条相反的道路，作者鞭撻了前者，贊美了后者。

达喀尔一尼日尔铁路工人的这次罢工，有力地显示了非洲工人阶级的力量，在非洲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时间过去十多年了。非洲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也都已觉醒，不断起来斗争。烏斯曼的这本小说，由于它的鲜明的反殖民主义色彩，由于它歌颂了工人阶级的斗争，我们相信，将会受到我国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增加我国读者对非洲人民的了解，并给我们以巨大的鼓舞。

高駿千 1964年8月